

# THE LONG REVOLUTION

〔美〕埃德加·斯诺 著

东方极 译

# 漫 的

干劲  
游多快  
跃进  
好省  
道路  
民公社三面  
一切资本主义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革命样板戏  
赤脚医生暖万

# 漫长的革命

(美) 埃德加·斯诺 著

东方极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根据美国文达治出版公司  
1973年第一版 The Long Revolution 译出

## 漫长的革命

(美)埃德加·斯诺 著

东方极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69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48—0939—X/K·11

印数：1—13 500册 定价：2.50元

我谨把此书献给  
如此充分地帮助了我丈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和护  
士们  
并献给  
关怀和爱护我丈夫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洛伊斯·惠勒·斯诺

2111 7/11

## 致 谢

我非常感谢玛丽·希思科特，她作为一位编辑和朋友同我的丈夫一道工作了许多年。在本书写作期间，她同他一道在瑞士，而在他去世以后，她在纽约继续从事整理原稿的工作。

我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欧·埃德蒙·克拉博，他仔细地阅读了原稿，就像以前他对待我丈夫其他的书一样。

特别感谢琼·波霍里利斯，他设法弥合了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使得全书更为协调。

## (英文版)出版者的话

一九七二年二月，埃德加·斯诺从他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回来。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去世。如果他还活着，无疑会仿照他给《西行漫记》和《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的新版本写注释和书目提要的方式，给本书附加有关文件和资料。他一定会根据他的笔记，扩大他一九七〇——七一年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记叙。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她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的来信中说：“这部书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刚写了个开头就因为我丈夫的去世而突然终止了。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这些种子将发芽生长。”

(美国)兰登书屋

# 目 录

<b>第一章</b>	<b>一个不同的国家吗</b> .....	1
1	相逢在天安门.....	1
2	周总理的暗示.....	4
3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9
4	普通公民王某.....	17
<b>第二章</b>	<b>医疗保健和人口控制</b> .....	23
5	针灸堕胎.....	23
6	什么是针灸.....	26
7	性和人口统计.....	31
8	一些特殊情况.....	40
9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43
<b>第三章</b>	<b>崇拜与热战</b> .....	50
10	降低个人崇拜的热度.....	50
11	文化.....	55
12	控制宣传.....	63
13	公开的战争.....	69
<b>第四章</b>	<b>军队、党和人民</b> .....	76
14	军事专政.....	76
15	“为人民服务”.....	82
16	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86
17	爱鹿思在南泥湾.....	92
18	军队和人民.....	102
<b>第五章</b>	<b>人民公社</b> .....	108
19	起源.....	108

20	令人动情的旅程·····	110
21	贫富之间·····	114
22	回顾与展望·····	115
<b>第六章</b>	<b>同总理彻夜长谈·····</b>	<b>118</b>
23	周恩来与敞开大门·····	118
<b>第七章</b>	<b>同主席共进早餐·····</b>	<b>127</b>
24	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127
<b>第八章</b>	<b>尼克松要到紫禁城去·····</b>	<b>135</b>
25	实力地位·····	135
<b>附录一</b>	<b>山南海北</b>	
	——1965年1月9日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	144
<b>附录二</b>	<b>天下大事</b>	
	——1964年与周恩来总理的两次谈话·····	170
	<b>编后记·····</b>	<b>182</b>



# 第一章 一个不同的国家吗

## 1 相逢在天安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是北京十月里一个完美的日子。我端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突然被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我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领着我与我的妻子洛伊斯走到毛泽东的身边站着。有好一阵时间，我们就站在占世界人类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位置上。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总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对面可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块木标语牌上写着毛泽东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的一句话，远离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标语牌上写的文字。那是宣称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抗朗诺的政变和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新成立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身边。亲王微笑着（他总是面带微笑），这时，我的妻子说，反对侵略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对此，亲王热情地回答道：“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词汇中，走狗的意思是卑屈的同谋。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寿辰那一天，《人民日报》登载了

我们在城楼上的照片，称我是一位“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右上角每天都刊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尽力把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种情况的话，那末，我倒乐意作这样一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着许多反对武装侵略和破坏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我站在那里，是为着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美国的反战者终于将结束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大错”的战争。是的，我站在那里，是为着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但事情也不止于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的一双手瘫痪了，因此隐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我却注意到他握手跟以前一样有力。他比一九六五年我上一次看到他时清瘦了一些，但却显得更健康——我现在才知道，正是在一九六五年那个时候，他正要采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至关重要、极富胆略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算他的党所选定的继承人、共产党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毛简略地跟我谈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我们一起注视着那些精巧的彩车和展览车开过去。组织得太周密了！人们穿着色彩缤纷、式样繁多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的同样单调的衣服，形成了对照。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的代表都在那里，中国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吧，他们操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在七亿五千万到八亿之间。节日

的主题是生产和战备；穿着蓝灰色制服的人，比比皆是，但除了青少年民兵手中握有武器以外，人们甚少看到武器。青少年民兵中包括梳短辫的女孩。

一辆辆彩车鱼贯而过，每辆彩车歌颂毛的著作、名言和指示，这些都在公社、工厂、文化生活和军事生活中为人们所遵循。最壮观的彩车上是：崇山峻岭被隧道穿透，桥梁连接了隧道，铁轨上一列模型火车在奔驰。这个模型象征着中国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把最边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方边陲连接起来。雕像和半身像触目皆是，有些尺寸很大，塑的是我旁边直立的那个人，他是第二次的解放即文化上的解放的领袖和创始人。这第二次的解放旨在使革命像原来那样纯洁，旨在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城楼下人们异口同声地高呼，许多人的眼睛迸出了热泪，不单单是年青人如此。

我不由得指着那些充满崇敬之情的游行者问道：“您觉得这一切怎么样？您有何感受？”

毛微露嗔色，摇摇头，又说情况有所好转，但他是不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他未来得及回答，我们的谈话给新到来的游行者打断了。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得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来——也就在那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嫌”的。而我这才发现，在十月那天，他想着的不是那些肖像、旗帜和花束。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机构的问题，想的是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失去的生产节奏，想的是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接触。他是否想到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了呢？

他问我，我们美国现在是否有着各种各样的造反？美国的反战运动给他留下了印象（他在五月二十日的声明里已经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他希望听到更多有关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就会再次会面了。

## 2 周总理的暗示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中，我曾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一九六〇年，我终于得以重返中国，并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我两次回去，最近这一次访华是一九七〇年。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没有到过中国，虽然中国方面曾提出给她发入境签证，同我一道前往。但是，在较早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却拒绝使她的旅行中国的护照“生效”，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候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

我自己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五年旅行中国的护照，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层施加了压力以后才“生效”的。随后我向同一的华盛顿高层所作的报告，自然遭到了忽视。我十年来所写文章中那些有用的消息，却没有渗入高层的决策阶层。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展新关系”的机会也失去了，肯尼迪不久就忘了他的话，而在其总统任内，使我们身陷越南的丛林中。

此刻洛伊斯就在我的身边，她成了少数几位进入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妇女之一，她以她那双机灵而聪颖的眼睛来补我的眼睛之不足。我们于八月初到达北京，身受着北京人所称的秋老虎热——不过由于有了无数绿荫，加以北京周围造了

林，因此炎热程度多少减轻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初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获准到北京以外的城市去旅行，哪怕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同情者，也不例外。以前照例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以至富丽堂皇的北京博物馆和宫殿），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同洛伊斯重游旧地时，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深受鼓舞，希望（他们的希望是正当的）“最紧张的时期”将要过去。

我们在两所我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一所是燕京（译注），我曾经在那里讲过课，另一所是燕京附近的清华，它是一所著名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取了文化斗争和大学动乱那几年间的第一手情况介绍，还有红卫兵的故事及其余波。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农村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听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侧面情况。其后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然后从陕西的省会西安到了著名的战时游击之都延安。接着西行至保安即志丹（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我们是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一九三六年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所在的群山中，那时候，毛泽东是一个被追捕的“赤匪”。我们参观了一个国营农场，这个国营农场由军队和一所政治改造学校管理，在那里，前西安市党委的一位书记领我们参观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的猪栏。其后回到西安，再回到北京，看了许多演出，在美味的餐席上同老朋友海阔天空地聊天，接着就到了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业，参观了一所由军队针灸师管理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其后南下至广州，参观了广交

---

（译注） 实际指北京大学

会。接着再北上前往东部沿海和产茶的浙江，然后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去，看到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离开中国以前的六个月中，我一共参观了十一个公社，这样一来，我先后就访问了三十三个公社（它们遍布中国各个区域）了，在过去十年中，我在那里一直受到了欢迎。现在，到处农田都一片翠绿，更加平整，梯田开得更好，树木繁茂，因之更加接近毛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吸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多年来第一次看见西方人，非常吃惊。不用说，这还是乒乓球（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情。

而正是在打乒乓球的地方，周恩来总理最先欢迎我回来。

那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我们被邀请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我已约好和人一起吃晚餐，因此我们谢绝了邀请。正在吃着烤鸭时，我的朋友姚伟（以前我曾经同他一道历过许多险）打来了电话，简单地说：“准备走一趟。”这是要我去见一个人的意思。我猜测这可能是总理的要求，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漂亮的新建筑物，有一万八千个座位）见到他同八十多岁的（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有风韵的妻子，总参谋长黄永胜，李先念副总理和一大群其他的著名人士，就座贵宾席。

我们到达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很快，我们被叫到一间会客室去，他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象过去一样机敏，头发开始呈银灰色，他穿着一件夏天运动衫和一条灰色裤子，足穿凉鞋和白色短袜，他亲切地向我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就谈起政治来了。（传达员不断

把比分传达给他，因此比赛结束时他能够在场。当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下到表演场去，同队员们握手表示祝贺，并一起照相时，表演赛达到了高潮。）

总理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这使我觉得奇怪，他是不是认为我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分严重，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大规模的新军事行动的主动性”呢。他把这个问题交回给我，由我自己作出答复，但提醒我说：“中国在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

“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我问道，“那末，同俄国谈判还是同美国谈判可能较好呢？”

“我一直问自己这一个问题。”他回答说。

这时，传来的乒乓球比赛的积分已经显示比赛接近结束了，总理说我们在下次会面时将谈谈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喝完自己的咖啡，就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

十月一日，我短暂地见到了总理，当时他说，美国人曾经提议恢复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在那个月的较后时间，我问他一些问题。在十一月五日，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厅，同我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和交谈。总理照例有着重要的事情要说——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在北京的一次可能的会谈。

至于中国的条件，他们依然是首先要求美国从台湾岛撤走它的武器和舰艇。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允许我从我们的交谈中直接引述几句话，其中有：“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当以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去维持世

界和平。”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此刻，周重复了他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五年对我正式说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周说，“美国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准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他此刻补充了一些消息。他想起了尼克松总统于一九六九年就职时，曾经宣称他赞成缓和紧张局势，并希望同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经通知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那末讨论可以在中国举行。对此，北京回答说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派一位特使来讨论台湾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有答复。接着就发生了一九七〇年三月入侵柬埔寨事件。中国人得出了结论，尼克松说话不当真。

“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却看美国是否认真处理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所有其他的问题，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那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从其他的评论中，我明显觉得，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看作是诡计。他们不仅密切注视着他在东南亚的策略，而且密切注视着建立日本的军事力量以便替美国管理其在东南亚前线“防卫阵地”的行动，以及以中国为代价来开始同俄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是随意地谈话的，因此总是弄不清楚会见到哪里结束，而当时不能发表的交谈又在哪里开始。我根据我的笔



记写成了一篇长文提交校正。经过了一个星期，清样才送来。正式的译文，略去了上面印刷的话。就在那个星期里，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到达了。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在此以前，授权一位特使（亨利·基辛格先生）访问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再经过了几个星期，我就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特使可能很快会到北京来了。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受到信任被告知这样的消息呢。我记起，在一九三六年，当我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时，我获知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同红军达成了秘密协议，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成立抗日统一战线。那时候，我竟会获得那样的消息，也是大有原因的吧。

### 3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一心关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它们竟需要重建呢？这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详尽地解答，这在以后将说到，不过在这里，提出几个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可能是有用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使没有暂时瓦解政府的话，那也暂时瓦解了中国共产党。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一九六六年年中，一直继续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那时候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来成员加上“新鲜